

# 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檀香刑》

田璐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法律与文学是近年来交叉学科研究潮流中颇具趣味的一支。莫言的《檀香刑》以大胆、泼辣的笔法和奇特的叙事方法描述了司法制度中的重要主题——酷刑作为国家权力极端展示形式的意义,以及死刑执行人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集权制度之下的异化,而莫言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判亦展现在这种异化当中。文章将从法律与文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这部作品中的酷刑、刽子手以及它对历史微观而多元的解读方式进行解析。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 酷刑 权力 刽子手 历史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2-0094-05

莫言潜心五年写成《檀香刑》,全票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尽管最终落选,但作品从面世起即引起强烈反响,倍受争议。它讲述了一个人物关系复杂的奇特故事: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高密东北乡的茶馆老板孙丙学义和拳领导乡民起义,山东巡抚袁世凯令高密县令钱丁抓捕孙丙,并请告老还乡的“满清第一刽子手”赵甲用残酷至极的檀香刑将其处决于天台之上。其中,钱丁是孙丙之女孙眉娘的干爹兼情人,赵甲是眉娘的公爹,故与孙丙是亲家,协助行刑的是赵甲之子、眉娘之夫小甲。

《檀香刑》看点颇多:六场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名刽子手的传奇人生,一位美艳少妇与斯文县令之间的缠绵爱情,既柔情万种又令人毛骨悚然……莫言的叙事技巧奇特,语言风格多样、流畅而富有节奏,给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从法律与文学的角度看,《檀香刑》深入探讨了有关法律与司法制度的重要主题,即特定历史背景下,作为权力的极端展示形式的酷刑及其意义,以及司法制度中关键但常被忽略的角色——死刑执行人(刽子手),深入地展现其作为国家机器的刽子手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追求。

## 一、酷刑

“中国什么都落后,但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痛苦

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sup>[1]</sup>

《檀香刑》中的酷刑是小说最大的噱头,对其浓墨重彩的描摹展示了令人震撼的司法场景,六场酷刑,五种刑罚:砍头、腰斩、阎王门、凌迟、檀香刑。刑场上的色彩、声音、气味被莫言丰富的想象力近距离残忍而生动地展示出来。莫言借刽子手赵甲之口不厌其烦地讲解它们的传说、程序、规则、技巧……

福柯将酷刑理解为一种司法政治仪式,认为任何犯罪都被视为对主权者的攻击,而酷刑则是主权者的疯狂报复,尽管它总是借正义之名,但彰显的却是法律背后主权者的绝对权力<sup>[2](P52-54)</sup>。主权者可以随意处置“正义”,决定“正义”何时实现,如何实现。同时,酷刑又是一种仪典,它庆祝主权者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强权者的正义和真理从中得以强化。因此,酷刑是国家权力最极端的施展方式,它直接作用于人的肉体,从猩红的血液、支离身体的器官和肢体、被痛苦挤压出的悲号乃至失禁的粪便中显露自己狰狞的面目,抽象的权力获得了色彩、声音、形体,变得具体、精细、可感观。

福柯概括了酷刑的三个标准:首先,“它必须制造出某种程度的痛苦,这种痛苦必须能够被精确地度量”;其次,“死刑也是一种酷刑,它不仅剥夺人的生存权,而且它也是经过计算的痛苦等级

\* 作者简介:田璐(1982-)女,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0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诉讼制度史。

的顶点”；最后，“它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sup>[2](P36-37)</sup>。其中，知识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它表现为刽子手的常识、技术、技巧、经验等。酷刑凭借知识而获得令人恐怖的效果，其名目花样繁多，程序琐细讲究，无不蕴含着可怕的智慧，它呈现痛苦的方式挑战着人类思维和想象力的极限，给人难以想象的刺激。这些在莫言对凌迟精细到冷酷的描述中有生动的展现：

凌迟，又称“鱼鳞割”，俗称“千刀万剐”。据说记载各种刑罚及施行的具体方法和注意事项的古书《秋官秘集》上记载凌迟分三等，第一等要割3357刀，第二等要割2896刀，第三等割1585刀，不管割多少刀，最后一刀应是罪犯毙命之时：

“所以，从何处下刀，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来精确设计。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已经毙命或是割足了刀数犯人未死，都算刽子手的失误……完美的凌迟刑最起码的标准是割下来的肉大小必须相等，即便放在戥子上称，也不应该有太大的误差。”<sup>[1]</sup>

因为难度极大，愈到近代，凌迟刀数愈少，五百刀已是极限。为保证刀数，刽子手开刀前会在犯人胸口猛击一掌，将其心脏打得紧缩起来，可大大减缓血液循环速度。这是数代刽子手在漫长的执刑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经验：

“如果碰到血流如注、无法下刀……应急的办法是劈头盖脸地浇犯人一桶冷水，让他突然受惊，闭住血道。如果凉水闭不住，就浇上一桶酸醋。《本草纲目》认为醋有收敛之功……”<sup>[1]</sup>

不过，执行刑罚的集会常常变得混乱，有时甚至成了民众起义的导火索。福柯认为国家废弃公开刑罚的一个直接政治原因在于：被处决者常常变成民众的英雄，会对国家权力构成直接威胁<sup>[3]</sup>。孙丙是猫腔戏的开创者，戏班在他受刑的天台前表演作为对“祖宗”的献礼和祭奠，其场面深深感染了围观乡民，显示出对强权的巨大冲击力。而犯人慷慨赴死、生受折磨而信念不移，形成对国家权力的蔑视和嘲弄，并在其中铸就自身的威望。例如，孙丙拒绝潜逃坚持受刑是因为“盼望着五丈高台上显威风，要让父老乡亲全觉醒，要让洋鬼子胆战心又惊”。英雄的胆魄因看客群集和刑罚残酷得以升华，酷刑就上升为衡量一个人死得是否有价值的重要参照。

莫言对暴力津津乐道引发大量批评。但正视

难道不比回避更高尚？文学家们以精神引领为己任，然而道德是多元的，且暴力无处不在，往复循环，传道的嘶声呐喊，不义仍旧横行。或许因此，莫言将暴力细细撕碎摊晒，让黑暗更触目惊心，而并不扯出一张道德大旗充当精神导师。莫言的细致描摹是一种解剖，只有正视暴力才谈得上认识乃至抑制。只是《檀香刑》在语言上稍过油滑欠节制，对待暴力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庄重。

## 二、看客

一切精心设计都为了观众。酷刑的价值恰是被放置于公共场合供大众观赏。<sup>[4]</sup>“刑罚和杀人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是‘抹杀不去的人类丑陋的历史史实’。”<sup>[5](P5)</sup>。从国家的角度而言，酷刑是权力暴虐施展的形式，是一场戏剧化的司法政治仪式，一场残酷的警示教育，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控制，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而从作为看客的民众角度来看，他们有时被强迫观看，但更多是自愿聚在刑场围观。他们目睹碎割肉体、鲜血淋漓而感到刺激、快意、好奇，他们想知道人的肉体能承受多大的痛楚，人在被戕残时会有何种表现，而这一切都无需用自己的身体来验证。小说里“戊戌六君子”被砍头后，京城看客回味无穷的“一是刽子手赵甲的高超技能，二是‘六君子’面对死亡时的不同表现”。鲁迅在《热风》、《坟》中对这些麻木、冷酷的中国民众有入骨的批判，但他重在揭示封建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伦理道德对人的精神进行控制和愚化，并构筑社会舆论氛围而使得自身得以传播和延续。而莫言承继鲁迅的批判，借赵甲之口道出人性深层：

“凌迟美丽妓女那天，北京城万人空巷……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sup>[1]</sup>

看客隐没在群体中，不被关注，没有监督，不必负责任，因此也就丧失道德约束，那一点点伪善的同情心便抵不过嗜血的猎奇、侥幸心理和落井下石、以强凌弱的偏好。群体无意识地暴露了人性最恶劣的一面：嗜血、冷酷、麻木、喜欢看到别人的不幸和痛苦……“群体没有逻辑推理能力，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

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sup>[6](P36)</sup>他们相信权力捏造并强加的正义，“残暴而狂热”。

看客是酷刑仪式真正的消费者，他们的存在使死亡的过程被延续、戏剧化，也激发了刽子手的创造力和表现欲，国家权力的展示因民众围观而有了体面、威严的必要。因此，酷刑成为人们平淡生活中的庆典，正是看客心理与权力的共谋。酷刑也因此在被注视的过程中获得形式上的审美价值。莫言浓墨细雕的两场凌迟就极力凸现一种暴力美学，他将这一节命名为“杰作”。受刑对象是一位潇洒的英伟军官——试图谋杀袁世凯的钱鹏飞，一名刚烈的绝色美人——被判谋财害命的青楼名妓。前者身体匀称健美，“隆鼻阔口，剑眉星目，裸露的身体上，胸肌发达，腹部平坦，皮肤泛着古铜色的光泽”；后者“肌肤华泽如同凝脂……天香国色，娇柔温顺的模样人见人怜……她一块心头肉……鲜红如枣，挑在刀尖上宛如宝石……”刽子手也因此更具使命感：

“面对着这样美好的肉体，如果不全心全意地认真工作，就是造孽，就是犯罪。你如果活儿干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你活活咬死……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戏，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sup>[1]</sup>

而这种审美趣味更集中地体现在讲究的仪式中，小说的核心——“檀香刑”便是集中展现。檀香刑，是将一根一端削尖的檀香木桩从犯人的肛门插入，再从口部或肩部穿出的酷刑，犯人将被活活串在檀香桩上竖立示众。檀香桩要精细地削成宝剑状，用砂纸磨光且放在油锅里和着白面、大米、牛肉煎炸三天三夜以沾染谷气肉气。

檀香木本身特别珍贵，此树幼苗期须寄生在凤凰树、红豆树、相思树等植物上才可成活，通常数十年方成材，同时，檀香提神静心，利于冥想，在宗教仪式中广泛采用，佛寺也常被称为“檀林”，因而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显得典雅庄重。此外，檀香还有神秘色彩而潜在地具有某种威慑力，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因蟒蛇喜欢盘踞在檀香树上，人们常据此寻找檀木。中国人还认为它能驱邪避小人。因此，强权藉由体面的外观获得非同一般的威仪，刑具的材质使刑罚更神圣，潜在地使其正当化。

### 三、刽子手

在人们心目中，刽子手的形象通常千篇一律：身形魁伟、一脸横肉，貌似威仪却低贱粗鲁，这种粗糙的印象折射出这个群体被忽略和蔑视的状态。小说中的刽子手赵甲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号称满清第一快刀，精通历代酷刑并有所发明创造的专家。他一生共杀过 988 人。这位刽子手在莫言笔下获得立体呈现，包括其人生经历、知识、技术、成就、责任感、人生观、价值观……

刽子手这一职业遭人鄙薄，因其工作被视为不洁。人们害怕杀人，害怕招致灵魂对生者的妒恨和报复，更害怕被冤魂缠身。加纳的塔伦西人认为，任何杀人皆为对抗大地神秘力量的罪孽并将导致杀人者家庭的毁灭<sup>[7](P12)</sup>。不可杀人是一项普遍的禁忌。而刽子手以杀人为生且不受罚，这个群体似与冥界相关，沾染血腥，制造冤孽，若他们杀了清白无辜者或正义之士，则更加罪孽深重。刽子手赵甲显得阴森冷郁，被眉娘骂做“妖魔鬼怪的老妖蛾子，猫狗见了都要绕着走”，太监骂他们“喝足了人血”……人们总对刽子手避之不及，而朝廷也并未将其列入刑部编制，不发给月俸。赵甲年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流浪到京城，饿得发昏误闯刑场，拜余姥姥为师，才干上刽子手。

赵甲极具多面性，他卑贱而傲慢，冷酷又虔诚……他的骄傲首先源自职业赋予其剥夺人生命的权力：“别人瞧不起我们这一行，可一旦干上了……你就瞧不起了任何人，跟你瞧不起任何猪狗没两样”，“同样是个杀字，杀猪下三滥，杀人上九流”。其次，国家权力给他的职业蒙上了神圣色彩，小说中的刘光第这样肯定刽子手的价值：“你比我更重要……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赵甲也一直自豪地宣称：“只要有国家存在，就不能缺了刽子手……为盗杀人，于理难容；执法杀人，为国尽忠……刽子手这行当，代表着朝廷的精气神儿……”再次，刽子手是一项需要知识、技术、经验的工作，一般人做不了。比如，执行凌迟“必须平心静气，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下手果断，既如大闺女绣花，又似屠夫杀驴”……最后，刽子手还要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具有非同一般的意志力。赵甲不断强调：

“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执行台前，眼睛里就不应该再有活人，在他眼睛里，只有一条条的肌



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作为一个优秀的刽子手，站在庄严的执刑台上时，是不应该有感情的。如果冷漠也算一种感情，那他的感情只能是冷漠。”<sup>[1]</sup>

关于刽子手的信息多是赵甲师傅教导的转述，表现出刽子手行业古老而严肃的传承，其中还配备着一套奇异的刽子手哲学。首先，刽子手行刑仪式庄重，之前会沐浴更衣，焚香祭祖，并用鸡血涂脸。

“为什么要用鸡血涂面？为了跟祖师爷保持一致，也为了让那些个冤魂厉鬼知道，我们是皋陶爷爷的徒子徒孙，执刑杀人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人间的苦痛就与咱无关了。咱家就是皇上的工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律。”<sup>[1]</sup>

同时，刽子手以皋陶为祖先，并将其神化：

“据俺师傅余姥姥说，祖师爷杀人根本不用刀，只用眼，盯着那犯人的脖子，轻轻地一转，一颗人头就会落到地上。皋陶祖师爷，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下巴上垂着三绺美须……余姥姥说，关老爷其实就是皋陶爷爷转世。”<sup>[1]</sup>

仪式、神话、传统有强大的庇护力量，它们不仅是企图为杀人正名的努力，也给刽子手提供心理保护。刽子手们明白杀人未必符合正义，借这些代代相传的神话、仪式来对抗杀人的恐惧，渐渐形成制度、传统，甚至成了人们认可的历史。刽子手这一行按经验界分等级，大清刑部狱押司里，共四名刽子手在册，年纪最大、资历最长、手艺最好者称“姥姥”。其余三人，分别称为大姨、二姨和小姨。忙月里临时雇请的帮工叫外甥。这些刻意混淆性别的称呼使他们罩上非男非女的神化色彩，以消释杀人的罪孽和可能的报应。奇怪的是，杀人是国家大事，刽子手这个群体却被刻意忽略和疏远，他们没有正式的编制，只能靠卖干腊、勒索店家的“省醋费”、在打造刑具的拨款中揩油。因为他们来自社会底层，遭到普遍的蔑视。但国家无意中将他们置于阴暗角落，将一切罪孽寄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被人为地隔离、回避从而给人一种非人非鬼的神秘印象，这就转移和消解了民众对冤孽的关注，模糊了杀人正义与否的问题。

其次，刽子手地位卑微，但他们从自己的丰富知识和高超技艺中获得荣誉感。倘若不义的死刑不可避免，他们也自有一套回避道德拷问的说辞，而从一种职业责任感中获得精神依托：

“刽子手对犯人最大的怜悯就是把活儿做好，你如果尊敬她，或者是爱她，就应该让她成为一个受刑的典范。你可怜她就应该把这活儿干得一丝不苟，把该在她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技艺表现出来。这同名角演戏是一样的。”<sup>[1]</sup>

评论家认为人物赵甲充分地展现出人性的黑暗，用残酷谄媚权力。这种批评在精神引领上固然重要，但不应坚持一种片面的道德批判路径。从莫言的描述中，我看到的是人在黑暗皇权专制下的悲剧性以及人在其中所展现出的承受力和柔韧性。刽子手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专制极权体系下被物化，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心理生理均被严重扭曲，而这些都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除了变得不像人，他没有其他选择。而在狭窄的人生路上，赵甲也在追寻荣誉，哪怕是依靠邪恶的智慧。他的专注、坚韧、顽强、敬业等高贵品质使他成了一个“人物”。莫言曾在散文《郁达夫的遗骨》中说：

“特殊的环境需要特殊的人物也造就特殊的人物，特殊的环境能把人变成野兽，在一个吃人的环境里，如果你不参与吃人的活动，很可能就要被人吃掉。这不是民族的问题，更不是人种的问题。这是政治家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问题。”

因此，莫言对社会和制度的批判展现在人的异化之中。

### 三、余论：历史评说

莫言对义和团抗德事件的解说不同于传统历史。猫腔戏班主孙丙因为嫉妒县太爷钱丁与自己相媲美的胡须而出言挑衅“斗须”。刘光第之子刘朴在父亲蒙难后被钱丁收留任用，刘朴感恩，遂报复对钱丁不敬的孙丙，薅了他的胡须。孙丙丢了颜面，不愿再唱戏，便远走他乡开茶馆。孙丙怒杀调戏妻子的德国技师，导致村民被屠杀。失去一切的孙丙不甘平庸苟活，回乡树神坛领村民攻打德国人的筑路窝棚。这其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在莫言的多主体叙事中展现，足见其非凡功力。

但莫言遭到了评论者的批评，因为他将历史书上高歌颂扬的农民运动描述为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合，而不是有意识有目的抵抗。他没有把孙丙歌颂得光彩崇高，而突出他的虚荣、好出风头、不负责任，也处处展示出乡民的愚昧，抗德活动就仿佛是一出迷信的滑稽剧，尽管壮烈，却可悲。农民抗德的行动并未上升到维护主权的高度，而是他们认为修铁路破风水、毁祖坟而自发抵制。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下转第102页）

瞽乱,巷陌多绕纡。河之水悠悠,城东得遗躯。终时作何状,割爱从鼃鱼”郑孝胥为了得到更详尽的情况,给他的妹妹去信。他妹妹在来信中交待了发现栗兄亡故的详细过程。“为弟诚无状,不能掺其祛。两兄挈一侄,何许相睢盱。知死不可让,以次当及余”,郑孝胥还是延续上一首“我欲叱阎罗”无理而有情的感情基调。“知死不可让,以次当及余”,死亡这件事情不能退让,按照次序下一个就是诗人自己了。

最后两首诗,诗人逐渐恢复理智,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心理过程。“死丧虽身戚,后死方有事”,往者已矣,不可追摹,诗人自谓“后死”之人,他还是有事情要完成,有责任要承担的。“门中二十口,舍我将谁寄”,除了他之外,二十余口人没有人能够依靠了,郑孝胥认为他必须承担起责任。“致书使亟来,恶瘴犹为厉。汉阳趣赁屋,规以安汝辈”,郑孝胥因为悔恨自己不能及时把他们接出来,才会接二连三发生悲剧,所以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眷属都接到汉阳赁屋居住。“三棺当暂厝,闲岁待我至”,郑孝胥两个兄长、一个侄子的棺椁暂且安置,等到有时间了,他回到老家会办妥此事。“解衣斲苍山,和土将血泪。筑成名恨塚,偿我无穷意”,诗人要好好地安葬死去的兄长、侄儿,以弥补他心中的无限悔意。“炳乎汝勿归,父死叔尚在。东行吾计定,世乱重抱来”,炳侄是栗兄的儿子。郑孝胥告诫留学东洋的炳侄,不要回来,不要悲伤,不要改变计划。诗人还安慰自己的侄子说,虽然父亲去世了,可叔父还在。这首诗就像郑孝胥的家信,平平淡淡中蕴含着深沉而厚重的情感。

“稚辛闻此变,千里来共哭。四支已半摧,一手倚一足。作书寄孀妹,天地此骨肉。事牵难久留,送汝使我独。登舟一悽惶,去去意殊酷。楼头卧更起,船尾灯犹绿。江波闇涨天,

风雨欲揭屋。余生付残世,何地同嚼粥?”这是诗人回归武汉的心情,“作书寄孀妹,天地此骨肉。事牵难久留,送汝使我独”,郑孝胥受打击真的是太大了,“孀妹”在料理完兄长的丧事后,不能忍受痛苦,也抑郁而终<sup>[2][P120]</sup>。“江波闇涨天,风雨欲揭屋”,诗人回到汉阳,江波声震天,疾风暴雨欲掀翻屋顶。“一切景语皆情语”,郑孝胥所写既是夏季长江到达汛期情景的写照,又是其内心所蕴弥天痛苦的写照。“余生付残世,何地同嚼粥”,痛失两兄、一妹、一侄,再难享受到与家人团聚的快乐了,唯有将自己的余生付与这衰残的世道。

郑孝胥的《述哀》诗没有华丽的词汇,没有过多雕琢的痕迹,只是以一种朴近乎拙的表达方式,以人之情感本能的发展为脉络,把诗人内心真实的情感传达出来。人世间的每个人都会经历生离死别,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郑孝胥的《述哀》诗不仅写出一己之情,更传达出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动人心魄。另外,郑孝胥这组诗虽为悼念亲人而写,却也折射出晚清的社会现实,瘟疫、战乱都是百姓生活的磨难,从这一点而言,这组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于郑孝胥的哀挽诗,王赓《今传是楼诗话》有评论云:“海藏每谓诗之佳者,必其人哀乐过人,此语不啻自道。集中如《小乙》、《述哀》诸篇,固已流传万口矣。弢庵(陈宝琛)题《海藏楼诗》,所谓‘我读述哀作,声泪一时进’者也。”<sup>[2][P555]</sup>郑孝胥用看似朴拙的技法,传达出一种人类普遍的至情至性之情感,感动了当时的诗坛,成就了其“工于哀挽”的名声。

参考文献:

- [1]郑孝胥.郑孝胥日记(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上接第97页)娘”。历史是权力建构出来的,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并且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同时,历史也建构着权力。统治者在历史的认知中划分界限建立同盟,通过关系亲疏、派别确定道德判断的标准,历史也成为权力正当性的一种支撑。而真相如何,却不那么重要。莫言采取多主体多角度的叙述方式也是为更好地展现每个人最真实的欲望、需求和价值判断,而认识角度的多元避免了对历史陷入单一道德标准的评价,提供了更丰富的思想资源。他的叙述更少脸谱化的正统塑造,更生活化,更为多元,也更贴近真实。莫言的立场似乎背离了正统标准,在参赛作品中显得颇为另类,最终未能入选茅盾文学奖也并不意外。但《檀香刑》的气度、格局、力

量在当代绵软的文坛中难有比肩者。

参考文献:

- [1]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 [3]苏力.福柯的刑罚史研究及对法学的贡献[J].比较法研究,1993(2).
- [4]余杰.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J].社会科学论坛,2004(3).
- [5][法]马丁·莫内斯帝埃.人类死刑大观[M].袁筱一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 [6][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7][美]唐纳德·布莱克.正义的纯粹社会学[M].徐昕,田璐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